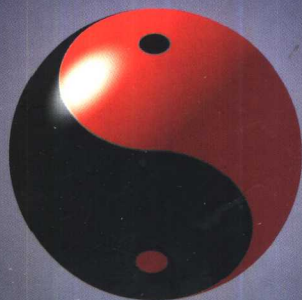


天
从
地
书
人

周子通书

【宋】周敦颐 撰

徐洪兴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
从
地
书
人

周子通书

【宋】周敦颐 撰

徐洪兴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子通书/[宋]周敦颐撰;徐洪兴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

(天地人丛书)

ISBN 7-5325-2797-2

I. 周... II. 周... III. 周敦颐-理学
IV. B2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080 号

天地人丛书

周子通书

[宋]周敦颐 撰

徐洪兴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125 插页 5 字数 78,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50

ISBN 7-5325-2797-2

B·314 定价:7.00 元

用。文。学。的。意。义。在。于。对。人。的。教。育。和。对。人。的。启。迪。而。不。是。对。人。的。联。系。和。对。人。的。控。制。

出版说明

儒家自孔子开派以来,留意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礼乐刑政之术,其间虽有仁义中和之谈,但大抵不越日常道德之际。汉唐诸儒治经,大多着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罕及本体。及至宋儒,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原始儒学的特色是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人伦的,而源于宋、延及明清的儒学(即理学)的特色则是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本体的。

北宋周敦颐作太极图,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此后理学昌盛,大致可分三大系统: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一系强调“理”,陆九渊(象山)、王守仁(阳明)一系注重“心”,张载、王夫之(船山)一系着眼“气”。清初的颜元(习斋)初尊陆王,转宗程朱,最终回归原始儒学,以“实文,实行,实本,实用”为治学宗旨。

《天地人丛书》选取宋明及清初诸位大儒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凡8部,为《周子通书》(以清道光二十六

年何绍基刻《宋元学案》本为底本)、《张子正蒙》(以清同治四年金陵刻《船山遗书》本为底本)、《二程遗书》(以清同治十年涂宗瀛刻《二程全书》本为底本)、《朱子近思录》(以明嘉靖吴邦模刻本为底本)、《象山语录》(以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刻《象山先生全集》本为底本)、《阳明传习录》(以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本为底本)、《船山思问录》(以民国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船山遗书》本为底本)、《习斋四存编》(以民国十二年四存学会排印《颜李丛书》本为底本)。每部书前冠以专家导读,勾勒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奥妙,探索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以期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一代宗师的学术个性;同时,整套丛书亦勾画出儒学前后发展的主线,是问津宋以后儒学演进、下探当代新儒学源流必读的入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4月18日

NAF226/06

目 录

周子通书导读	徐洪兴 1
周子通书	29
诚上第一	31
诚下第二	32
诚几德第三	32
圣第四	33
慎动第五	33
道第六	33
师第七	34
幸第八	34
思第九	35
志学第十	35
顺化第十一	36
治第十二	36
礼乐第十三	36

务实第十四	36
爱敬第十五	36
动静第十六	37
乐上第十七	37
乐中第十八	37
乐下第十九	38
圣学第二十	38
公明第二十一	38
理性命第二十二	38
颜子第二十三	38
师友上第二十四	39
师友下第二十五	39
过第二十六	39
势第二十七	39
文辞第二十八	39
圣蕴第二十九	39
精蕴第三十	40
乾损益动第三十一	40
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40
富贵第三十三	41
陋第三十四	41
拟议第三十五	41
刑第三十六	42
公第三十七	42
孔子上第三十八	42

孔子下第三十九·····	42
蒙艮第四十·····	42
附录 ·····	45
太极图([宋]周敦颐)·····	47
太极图说([宋]周敦颐)·····	48
朱子论太极图([宋]朱熹)·····	50
朱子论通书([宋]朱熹)·····	77
朱陆太极图说辩([宋]朱熹 陆九渊)·····	104
黎洲太极图讲义([清]黄宗羲)·····	125

周子通书导读

徐洪兴

周敦颐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这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那篇中学语文教材中必选的传世佳作《爱莲说》。但是,稍稍了解一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的人都知道,周敦颐之出名,主要不在于他写了《爱莲说》,而在于他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山人物之一。

《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黄百家曾这么说过: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程颢、程颐)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胡瑗)、徂徕(石介)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①

黄百家指出,从理学发生的实际历史过程而言,胡瑗、石介等“有开之必先”之功;但从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即“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而言,则数周敦颐有“破暗”之功。这基本上还是符合北宋理学发展之实情的。^②

① 《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

② 详参拙作《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版。

周敦颐的著作并不多，存世的就更少，仅《太极图》（并《说》）、《通书》及少量的诗文。而所谓其“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的文字，应该说主要也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一、《通书》之名

关于周敦颐的著作，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记载，当推其友人潘兴嗣所作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潘氏在《志》中记周敦颐：

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①

这里，周敦颐的著作难以标点断句。传统上是按朱熹之说来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我们知道，朱熹是收集、整理、注解周敦颐著作并弘扬其思想的第一功臣，他在《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中说：

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②

在其下的自注中朱熹又云：

先生（周敦颐）《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瓘）所著。其一《系辞说》，又

① 《周子全书·濂溪先生墓志铭》。

②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下引只列篇名）。

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决非先生所为可知也。^①按朱熹的说法，潘《志》所记周著当为三种，而其中的《易说》一种在当时已不传世。晚近以来，这一传统的说法受到了挑战。邱汉生先生对潘《志》所记重加断句，认为周敦颐并没有作过《易说》，而只是作了《太极图·易说》和《易通》。此当然不失为持之有据的一家言，兹不具论。^②

接着，朱熹开始说《通书》：

《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③

朱熹此疑的证据就是潘《志》所记书名。但朱熹的学生度正却别有一说，他根据傅耆给周敦颐的两封信中提到，周曾示傅以《姤说》和《同人说》之文，而在跋周敦颐《贺傅伯成手謁》中推论道：“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尝以《姤说》示之，其后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说》。二《说》当即所谓《易通》者。”^④后来，度正的推论无人认同，而朱熹之疑则影响颇大。

我们从《通书》流传的实际状况来看，早在朱熹之前，

①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② 详可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理学开山周敦颐》，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③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④ 《周子全书·贺傅伯成手謁·跋》。

胡宏为之作序、祁宽为之作跋,都已作《通书》了;①又朱震于宋高宗绍兴四年甲寅(1134年)所上《汉上易解》的“经筵表”中,亦谓“敦颐作《通书》”;②说明此书在南宋初期已名《通书》。据祁宽的跋文,此书之流传主要出自程门(说见下),推想下来可能是二程兄弟或程门中人所改。至于为何有此一改,及究竟何人所改,早在朱熹之时已无从考定。

总之,朱熹的观点,一般能为学界所接受。但人们仍因旧惯(包括朱熹本人),习称其为《通书》而不称《易通》,所以这一名称也就一直沿袭至今。

二、《通书》与《太极图说》之关系

《通书》与《太极图说》,从其流传之始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是关于版本的,一是关于义理的,而后者的重要性应该说要在前者之上。

我们先看版本关系,这主要是一个考据的问题。祁宽在其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年)所作的《通书·后跋》中说:

(《通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仲良),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震)。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尹和靖(焯)

① 胡序、祁跋见《周子全书》。

② 见《宋史·朱震传》。

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传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周敦颐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①

从上可知，祁宽共经眼《通书》的三个本子：其中两种出自二程及门弟子，一由程颢弟子侯仲良所传，一由程颐晚年高足尹焞所传；另一种是九江周敦颐后人家中所得家传本。程门传本与周氏家传本在《通书》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祁宽仅“校正舛错三十六字，疑则阙之”^②。而它们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卷末均附有《太极图》，后者没有此图。

对这个重大区别，祁宽只作出了令人难以满意的含混解释，“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或云”者，据说也。据谁所说？他没有讲。作为程颐二传弟子的祁宽（尹焞及门），大概是从师门中听说的吧？这还不是关键的问题，不讲也罢。最关键的是，在九江周氏家中是否另有单独的《太极图》（并《说》）的本子？祁宽也没讲。按常理来推的话，如果有此单独的本子，他应该会讲。这一问题之所以为关键，是因为后来有不少人怀疑《太极图》非周敦颐所作。

据我们目前所知，《太极图》（并《说》）在南宋初刊之时，都是附在《通书》之后的。一直到朱熹两次校定《通书》后，《太极图》（并《说》）开始从未附变成了篇首。

① 《周子全书·通书·后跋》。

② 《周子全书·通书·后跋》。

朱熹初次校定《通书》完毕，是在宋孝宗乾道五年己丑(1169年)。当时，朱熹经眼的世传本子已有春陵本、零陵本、九江本和长沙本四种。^① 这些本子都以程门传本为准，即于卷末附有《太极图》。^② 从此也可推知，祁宽所跋的本子亦是程门传本。但在朱熹看来，世传的本子统统本末倒置了，必须加以重新厘定。于是他以四个本子中“最详密”的长沙本为底本，进行了校勘工作。“长沙本”是胡宏的传本，所谓“最详密”者，就是指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③。可朱熹认为此本也有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图》与《书》“本末倒置”之外，“长沙《通书》，因胡(宏)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非先生之旧。”^④ 所以，朱熹的校定，除了一般的文字校勘外，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 一、“特据潘《志》，置《图》(《太极图》)篇端”；
- 二、“《书》(《通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
- 三、“即潘《志》及浦左史、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下引只列篇名)记曰：“周子书，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

② 按：朱熹《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云“建安本”(朱熹初次手定《通书》本)之前“《太极图》……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

③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④ 《周子太极通书后序》。

端”。^①

朱熹的这个初校本，就是“建安本”，书名则定为《太极通书》。

十年以后，即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1179年），朱熹完成了对《通书》的再校。再校之缘起，是由于朱熹又得《通书》的“临江杨方本”，以此与“建安本”比勘，“知其（建安本）舛陋犹有未尽正者”，所以再加校对。^②再校实际只是对“建安本”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其大的结构框架则根本未变。当时，朱熹正主南康军，这个再校本就刊于南康军的学宫，是为“南康本”。“南康本”遂成为周敦颐著作的最初定本，后世流传的《周子全书》、《周元公集》、《周濂溪先生集》、《周敦颐集》等种种版本，都是在这个“南康本”的基础上，不断增添后人的文字而衍变成的。

版本的问题即如上述，从中我们不难发觉，朱熹的改动实无多大考据上的支持。他把《太极图》（并《说》）从《通书》末附变成了篇首，依据的材料仅潘《志》一证。但潘《志》对《太极图》和《易通》是分别记载的，当中还夹了一种《易说》，且不论《易说》与《太极图》是分还是合。所以，朱熹的改动，未必就符合潘《志》之实。至少，他无法解释祁宽所经眼的周氏家传本《通书》为何无《图》的问题。对这一漏洞，素重“格致”的朱熹不会不知道。因此从实质上讲，他之所以有此一改，原因主要不是出于考

^① 见《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② 参见《再定太极通书后序》。